

虱痒沾身心渐痛 萤灯独照夜更浓

——评贾平凹《带灯》

魏晏龙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在长篇新作《带灯》中,作家贾平凹一边以萤为喻,成功塑造了一个在黑夜中步履蹒跚却依旧带灯独行的乡镇基层女干部的形象;一边又用虱作比,暗指无法得以彻底解决的基层的矛盾和纠纷。带灯,也就是萤,被贾平凹置于中国社会基层现实的中心地带,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折射出了正在变革中的中国农村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对于萤和虱两种小虫的传神刻画使得《带灯》成为贾氏长篇又一厚重之作。

关键词:贾平凹;《带灯》;萤;虱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5-0053-05

A Novel with Metaphorical Images of Firefly and Lice

——A review on Jia Pingwa's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WEI Yan-long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ly published novel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Jia Pingwa is successful in using the firefly metaphorically to mould a grass rooted working woman, a rural officer who staggered lonely in the darkness like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with a little lantern, while the metaphoric application of lice implicates unsolvable conflicts and dispute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The heroine, called Ying or Daideng (namely a firefly shinning with a little lantern) is placed by Jia Pingwa at the grass root level of the society in China, whose witness and thinking reflect a variety of issues in the changing course of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lifelike description of firefly and louse makes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another masterpiece of Jia Pingwa's novels.

Key words: Jia Pingwa;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firefly; louse

2013年1月,距《古炉》整两年后,刚过耳顺之年的作家贾平凹推出了第十四部长篇小说《带灯》。与《古炉》相同的是,《带灯》依旧接着地气,

紧紧地将故事和人物安置在陕西秦岭深处的一片叫做樱镇的土地上;与《古炉》不同的是,《带灯》并没有延续《古炉》中的小幅时空穿越,而是

收稿日期:2013-05-22

基金项目: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管理振兴基金项目(RW201018)成果

作者简介:魏晏龙(1977-),男,山东昌邑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应用语言学。

把故事发生的时间重新设定在当下,搭建在眼前。这样一来,《带灯》似乎又回到了立足现实,聚焦三农的贾平凹式的乡土叙事模式。实际上,喜欢不断在写作风格上锐意革新的贾平凹在这部近四十万字的新作的字里行间之中给读者和评论界再度呈现出一个前所未见但却依然固我的贾平凹。

一、萤之光:闪耀乡间皆因缘

以一个女性作为第一主角,这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是头一次。贾平凹是善于刻画女性的,其早期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饱含中国传统的柔性之美,如《浮躁》中的小水、《商州》里的珍子等;其中期长篇中的女性,如《废都》中的唐宛儿、《白夜》中之虞白及《高老庄》中之西夏,个个都是柔媚跳脱外不失充盈灵气,让人过目难忘;而其后期作品中的女性,如《秦腔》中之白雪、《古炉》中之蚕婆和杏开,则重新被涂抹上了中国传统女性善良温婉、从容坚贞的成色。贾平凹笔下的诸多女性人物个性虽然鲜明,但在一个个故事的主干脉络中起到的作用多是映衬,而非支撑。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贾平凹在把一个个故事多维且有序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用相当的笔墨来凸显女性角色性格的瑰丽多彩,一方面有意淡化了对她们生存手段的叙述,进而隐匿了她们应有的自力更生的主动意识和自我依赖的主观愿望,使她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去依赖于身边的男性角色。从这些角度出发来分析,带灯这个人物就实在是大大地与以往不同了,她从城市来到偏远的乡村,完全颠覆了传统贾氏女性角色的职业弱势,活脱脱把一个基层女干部的形象丰满张扬地呈现在虚构的民间之中和现实的读者眼前,如一抹初虹,弯搭在雨后的天幕中,妩媚而不失醒目。

如《高兴》中之刘高兴一般,带灯在现实中亦有其原型。正是这个原型执着且长久地和贾平凹保持短信联络,从而激发起了贾平凹新的创作欲望和灵感。《秦腔》的第一叙事者张引生是个疯子,《古炉》的一号主角狗尿苔则是个小升初年纪的儿童,而这次带灯以女儿身成为贾氏新作的

头号主角,于带灯原型而言,是顺理成章、当仁不让,但对于作者来说却是一次大胆的文学尝试。“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很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的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泼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1]356}。真实的带灯和作为文学人物的带灯都是这样的一种形象,敏锐而有才气,精细而不失泼辣,更难得的是能够长期和远山小村里的各色民众长期密切往来,随时接触到乡间田畴形形色色的人等物事。贾平凹把这样一个灵性满身的妻子精心装扮于笔尖之下、字里行间,通过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把一个充满着种种琐碎却生动、泼烦却真实的深山小镇描摹的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这样的角色选择之于贾平凹既是突破更是挑战。著名评论家、《带灯》的第一读者潘凯雄曾这样评价:“《带灯》是贾平凹长篇小说中惟一一部对当下现实不仅直面而且充满关切的作品。贾氏过往的长篇小说中固然有现实的因素,但像《带灯》这样充满了如此现实关切的则惟此所独占”^[2]。既然是用充满关切的目光去细腻敏锐地关注现实,那么借用一个女性、一个心细如发的知性女性、一个工作生活在乡村的知性女性的眼光来记录那一桩桩一件件大大小小的故事,满足了贾平凹对于细节描摹的要求和对于农村原生态本真面貌的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带灯选择了贾平凹作为倾诉的对象,贾平凹选择了带灯作为小说的主角,这个默契满满的双向选择或许可以被归结为一种莫名的缘分吧。

二、虱之谜:隔靴搔处留心创

贾平凹是善于使用隐喻的大师。在其诸多长篇作品中,独具慧眼的隐喻在增加了其故事的可读性的同时,更使其小说引人入胜、发人深省。隐喻之于贾平凹可谓信手拈来,在其长篇作品中更是俯拾即是,此处可随举几例。《秦腔》中以夏天智患癌身死和白雪诞下畸形儿象征着秦腔这

一陕西民间的传统艺术瑰宝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非常态发展,甚至是走向消亡的结局。而作为传统农耕文明坚定捍卫者的夏天义,最终却葬身于雨后滑坡的七里沟的泥土之下,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天人合一的乡村生存模式和思维理念也已不可避免地陷入颓势;《古炉》以小村书大国的宏篇隐喻自不待言,其中的那起丢钥匙事件也让人过目难忘。一家丢了钥匙,家家都丢钥匙,原来每家丢钥匙后都去偷别家的钥匙,结果是每家都丢了钥匙,每家也都偷了钥匙。在“文革”风浪的裹挟之下,古炉村人在互相伤害的同时,也在伤害着自身。此类隐喻已成为贾平凹小说的独特符号,有着极强的辨识度和感染力,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张颇具陕西风味的醒目标签。而《带灯》中最精彩的隐喻却竟是那让带灯和竹子们避之唯恐不及但樱镇百姓却见怪不怪的皮虱。

在贾平凹笔下,樱镇的虱子体色各异,品种繁多,生命力和繁殖力极强,颇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潜质。一旦被其沾身,用尽各种法子就再难摆脱。在弹丸之地的樱镇,小小的虱子恰恰象征着其民间积累已久的、长期无法得以解决的各色纠纷和矛盾、冲突和仇怨,其深度和广度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大到在大矿区打工身患尘肺病的工人的维权诉讼,元薛两大家族就河滩采砂地段的划分和利益的分配,再到各色救济款物的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格的认定及对于长期上访人员的监督和控制,小到个别村民的鸡毛蒜皮、针头线脑的归属认定等等,都在带灯负责的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范围之内。往往是过去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有时新旧问题互相渗透叠加,又催生出了更为棘手的难题。这就好比不同种群的虱子交配后又产生新的变种,防不胜防。这难怪会让带灯这样一个有灵气有心劲儿的基层干部也感到了极度的无奈。说到底,也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至于只能把心中的憧憬、感动、苦闷和无助一股脑地倾诉给那个远在省城的元天亮。带灯善于和乡村百姓打成一片,在各个村落都有着自己可以信赖和信赖自己的老伙计,然而她在走访群众的

过程中却始终坚持不在百姓家留宿,因为她害怕虱子。带灯这样一个面对书记镇长处事不妥敢于不违原则,连镇中元薛两大家族的硬气角色见了都要敬畏三分的刚强女子,却始终对小小的虱子避而远之、束手无策。这实在是典型的贾氏隐喻,很容易让人想到《古炉》中那让古炉村人头疼不已的“疥疮”,它迅速地在古炉村中散播,村民几乎无人幸免。人人都是传染者,又是被传染者;人人都有罪,又好像谁也没有责任,人人又皆是受害者。然而一比之下,《带灯》中皮虱的隐喻则更加隐蔽,晦涩之余让人回味,其文学弥漫性和穿透力也更强。就像那个樱镇办公室主任白仁宝所说:“上天要我们能吃到羊,就给了膻味;世上让我们生虱子,各人都有了痒处”^{[3]16}。皮虱沾身,如隔靴搔其痒,则充其量触及皮毛,寥寥数下,过后奇痒仍存;若褪靴用力搔之,痒感虽可暂去,但却容易挠破皮肉,过犹不及。小小皮虱,却道破了解决各色农村基层矛盾的艰辛和无奈。如何把握好解决这些矛盾的最合理、最适度的力道,因其触及民生大事,实在是值得着力去思考和总结的大问题。它们一方面在最底层的民间给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最接地气的注解;另一方面更是有力度地考验着基层政府的能力,考验着基层干部的智慧。让读者在为无数的带灯们寄以厚望的同时更捏了一把汗。

三、萤之痛:孤灯夜行苦无伴

在那个偏处秦岭深处的小镇政府里,容貌美丽且有些孤芳自赏的综治办女主任带灯实在是个另类。她选择放弃那个娇小可爱的原名“萤”正是去到樱镇后不久的事。缘起竟是她一次在某本古典诗词中看到“萤生于腐草”一说,她觉得这不好,就给改成了“带灯”。从改名这一小事就可看出带灯其实是不愿与身边的腐朽同流合污的。她的很多做派,用机关里的人的话说,就是还未脱学生皮,小资产阶级情调浓厚。但带灯偏偏在校毕业后没有留在城市,而是选择了樱镇。樱镇是丈夫的家乡这个理由有些牵强,“镇政府工资高,又有权势……”^{[1]10}。又让人感到她

并不是看上去那般超凡脱俗。其实带灯本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也就完全贴合了贾平凹长篇作品中几乎所有主角的共同特征。那一个个集各种矛盾冲突于一身的鲜活饱满的文学形象中如今又多了一个叫带灯的女子。

樱镇的是是非非实在太多,头绪纷杂,斩不断理还乱,完全是中国偏远乡镇的缩影。置身于各色人等,各种是非的中心地带,带灯的位置关键又易被忽视,她扮演的角色敏感又容易麻木。带灯说社会是“陈年蜘蛛网,动哪儿都落尘,可总得动啊!”^{[1]132}这充分说明了她不愿看到那个大社会的缩影,她所在的小小樱镇因为政府在诸多事件中的不作为或不当作为而成为尘垢处处、蛛网纵横的朽败老屋。整部小说中带灯忙碌于樱镇各村落的匆匆身影和她独处于山明水秀之处对元天亮的声声倾诉成了两条亮闪闪的主线,将一个动静皆宜的带灯活生生的置于读者眼前。在各村的老伙计的眼中,带灯就代表着镇政府,没有官架子,一副热心肠;在上访户的眼中,带灯也代表着镇政府,说一不二,不怒自威;而在给那个始终没有露面的元天亮的一封封信里,带灯则成了才情横溢、温婉乖巧的邻家小女生。带灯是矛盾的化身,她又置身于矛盾重重的樱镇,也就有了那么多充满矛盾的故事。由此亦可见贾平凹不凡的文学气场。

在前期给元天亮的信里,带灯没有诉苦,只诉衷肠,那时她把他当作情感的寄托、快乐和源泉;后期的信里倾诉工作中的各种苦闷无助的字眼明显增加,从中可以看出这位貌似潇洒的女综治办主任越来越扛不住了,顶不住了。她需要找人倾诉自己的叹息,那个远方的乡人自然成了最好的倾听者。带灯遍开药方能治了谁的病呢?小医是治不了大患的。这像极了《古炉》中的那个善人,用善良作为药引去疗救社会的病痛,到头来却换得被大火吞噬的结局。带灯也通晓诸多民间验方,但她治得了别人却无法自救。这实在是让人觉得心痛的反讽。面对老伙计范库荣和六斤的凄凉离世,她泪流满面;面对书记镇长在统计洪灾死亡人数时的瞒天过海,她愤懑无

奈;面对对公婆不孝的元黑眼的情妇马连翘,她当面怒斥;面对毛林等十三个尘肺病矿工和其妻子的悲惨境遇,她四处奔走;面对元薛两家为了沙场利益的集体群殴事件,她挺身喝止却流血倒地……小小的萤火虫已经遍体鳞伤、身心俱疲了,她的那盏在暗夜中依旧闪耀的小灯虽然弱不禁风,但对于在黑夜中踟躅的身影而言,那一星半点的光明就是一个大大的希望。相信没有人希望它破灭。但到了故事的结尾,带灯却患了夜游症,她虽然有灯在手,却依然在黑暗中迷失了自我,其症结其实就是孤独。带灯去看萤火虫阵的场面看似浪漫温馨,实际上却是她是在寻觅希望,寻觅摆脱孤独的希望。一点萤火既点不着火,又照不了路,而她向往的萤火虫阵却总是影影绰绰,若即若离。整部《带灯》在结尾处用扑灭希望的悲剧式咏叹给社会以振聋发聩的呐喊,让人震撼。

四、虱之患:小痒不除成大痛

纵观贾平凹后期的长篇小说,从《秦腔》到《高兴》,从《古炉》到《带灯》,贾平凹一直将关注社会民生的视角定格在农村的土地上。《高兴》中的故事的语境看似在城市,而主人公的精神所系却依旧是农村;《古炉》的故事语境虽然来了一个近半个世纪的小幅穿越,但剖析的依然是农村的人事、人性和人心。对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如此评价:“中国转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莫过于农民问题,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转型过程中,农民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贾平凹关注的正是这群在变革中深受重视的农民,他们的人数超过中国总人数一半还要多。贾平凹一直扎根于他所生长的土地,在这片充满矛盾冲突的土地上,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着一切,并从中超脱,成为一个睿智的记录者”^[3]。贾平凹是观察者、记录者,同时更是书写者。书写《带灯》的过程中,那一点萤光让他觉得温暖,“萤火虫的光是微弱的,带灯就是在黑夜中带了一盏光线很微弱的灯。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萤火虫一样,一点点光亮汇聚起来,就可以照亮好

多人”^[3]。

带灯而行的萤火虫的形象总体是美好的,给人以温暖,而与人肌肤相亲的皮虱虽然数目可观,形象却不大好,也往往易被忽视。这不光是因为它们同样渺小,更因为它们丑陋猥琐,嗜血如命,生命力极其顽强。它们看似来无影,去无踪,实则却是冤有头,债有主。在中国的基层民间,所有那些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纠纷和矛盾都会成为滋生虱虫的温床。社会的肌体如被皮虱沾身,如不及时去除,便会聚虱成群,积小痒也就成终成巨痛。民间有了上访,那便是在说社会肌体某些部位的虱痒加剧了。樱镇的领导对付上访的办法是说服不行威吓,威吓不行打压。恰如一个人一开始就没有把小小的虱痒放在心里,挠过不行就抠,抠过不行就抓,直到最后鲜血淋淋,两败俱伤。带灯从到樱镇伊始,就提议各村开展灭虱行动。但从上到下不但无人响应,还招来不少嘲讽和白眼。带灯恐惧着虱子,躲避着虱子,但最终还是没有躲过被虱沾身的结局,这似乎象征了单靠一个小小镇政府下设的综治办的一两个基层干部来解决所有陈年庞杂的民间纠纷和上访,是杯水车薪的徒劳之举。带灯只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即便竭尽全力,面对成群的皮虱,依旧显得是那样的羸弱无助,最终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夜游的困境,不能自拔。故事的结局是身为综治办主任的带灯也即将走上上访之路,恰好比萤火虫最终也加入到皮虱的行列中去,这实在是悲剧中的悲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聚虱成群,一副健全的肌体最终也会血痕道道、痛痒难耐。

贾平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写作《带灯》的过程中心情沉重。对于一个胸怀天下,情系民生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而言,这实在是很正常的情绪和反应。作家的忧患之心往往能够催生出不凡的作品,《带灯》便属此例。

五、结 语

《带灯》是贾平凹送给自己的六十岁生日礼物。贾平凹在其间有意回避了自己所熟稔的明清文学的柔美和细腻,而比较贴近两汉文学的平实硬朗。整部作品相较过去减少了陕西方言的渗入,同时语言色彩更显透明,节奏更趋轻快。虽然在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上有所微调,但贾平凹在写作过程中对于中国乡村基层民生的关切和忧虑却丝毫没有打折扣,凸显出了作者身上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不减反增。萤和虱两种小虫跃然纸上,飞舞灵动于字里行间,在细致描摹乡村各色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同时,将一个基层专门负责解决各类民间纠纷和矛盾的乡村女干部的形象塑造的圆润丰满,进退有致。贾平凹称全书扉页上的文字——“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是概括《带灯》这本书、这个人、这一生最切实到位的语句。的确,此句生动贴切,且不乏弦外之音。如何才能让带灯们尽情发光而不再流泪,是值得作者、读者乃至整个社会去思考的。

参 考 文 献

- [1]贾平凹. 带灯[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2]李萍. 贾氏作品中最瑰丽忧伤的创作[N]. 江西日报,2013-01-18(B4).
- [3]吴娜. 贾平凹汇聚微光照亮理想[N]. 光明日报,2013-01-18(09).